

明清

世态人情小说

史稿

王增斌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世态人情小说

史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史稿 / 王增斌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11

(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史稿)

ISBN 7-5059-2746-9

I. 明… II. 王… III. 小说史-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2395号

书 名	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史稿
作 者	王增斌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高本政
责任校对	文音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建新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13 千字
印 张	18.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746-9/ I. 2046
定 价	27.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言

张俊

王增斌同志所著《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史稿》，是一部系统论述明清以来中国世情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世情小说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首立专篇介绍，嗣后学者多注目于几部名著。王增斌同志此书，最大的价值是能从史的发展角度，对《金瓶梅》后之世情小说作了系统的分析评价，从而将该派小说的研究提到一个整体化分析的高度。王增斌同志把《金瓶梅》之后产生的中国婚恋家庭类小说，分为三个类别：一是以描写男女性事活动为主的艳情小说；一是以“净化”的形式表现男女青年在思想趣味一致基础上婚姻爱恋故事的才子佳人小说；一是在男女情爱婚恋伦常的描写中勾连社会，以广阔的笔触表现芸芸众生生活的世情小说。这种描述，基本上勾勒出了《金瓶梅》后，尤其是《金瓶梅》到《红楼梦》之间从最广泛意义上世情小说的发展流变。综合而论，王增斌同志的这部书稿表现了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新的材料。本书所论，除少数几部名著外（如《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大部分作

品是当今学术界很少提及或未进行过系统研究的作品，如《禅真逸史》、《禅真后史》、《醋葫芦》、《野叟曝言》、《续金瓶梅》、《蜃楼志》、《三续金瓶梅》等；短篇小说集如《豆棚闲话》、《石点头》、《型世言》、《欢喜冤家》等。这一部分内容，约占全书近70%。就这一意义而论，本书以一新的世情小说发展史专著，适应了当代学术研究的需要，对诸多埋没封禁多年的明清小说的普及和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对有关作品尽快从外围转向本体深入地探讨分析，无疑有其积极的作用。

二是新的方法。文革之后，学术界逐步清理了极左思想给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注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中国古代小说，使许多作品逐步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该稿对诸多世情小说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小说作为社会人生之反映这一角度立论。作者认为，分析评价一部小说的思想价值和总体倾向，只有把它放入所产生的时代社会人生中去检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部小说的是非得失，只有将其放入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其客观的是非功过，才能判明。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基于此，作者认为，《金瓶梅》的一大功绩就是“一改以往小说追求雄奇壮美的风格，以世俗风情的真实再现，直接为后世中国家庭伦理式世态人情小说开创了模式”。《禅真逸史》等书则是“纠偏《金瓶梅》纯粹表现市井生活的世俗化倾向，以虚构的历史将《金瓶梅》开创的对世态人情的描写向深层的雅化方向发展”等等，都是这一研究方法的具体体现。

三是新的观点。本书作者，主要是把《金瓶梅》之后产生的世情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据此，作者认为，整个明清时期世情小说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各阶段都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指出其基本特征。在具体的论述

中，作者亦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如称《醒世姻缘传》和《续金瓶梅》等是《金瓶梅》后世情小说发展的一个高潮，康熙乾隆时期是世情小说全面的鼎盛期。康乾时期出现的所谓“五大世情”巨著也是一个新的提法。作者认为，五大世情书，各有不同侧重：《野叟曝言》是“受国家统一盛强之感召，以浪漫想象之笔，虚构历史悠久的中华帝国对世界各国的征服，以表达儒家世界大同理想。”《绿野仙踪》则“主要表现报世理想难以实现的知识分子归而修道，企图借助道家神仙之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虚幻梦想。”《儒林外史》则是“抓住科举制下士人心态，以时代文人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衡准，揭示明清儒生在文行出处诸方面的表演。”《红楼梦》则以独特的“对封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以至社会人生的全面检评，跃登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华殿。”《歧路灯》一书，“则抓住封建时代败家荡子的教育问题，对旧制度的危亡，开出剂剂救世良方，企图挽救封建社会日益衰落的命运”等等。当然，有些观点，能否为学界所接受，尚待验证。

以上是我对这部书稿的一些粗略看法。如从精益求精考虑，本书稿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期望作者在正文部分依据五阶段的划分，结合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作较详细的论述，以使研究更富整体紧密性，也使具体作品在小说发展中的地位更明确。二是世情小说发展的五个阶段前，似应加上世情小说发展的前史，以成一部完整的中国世情小说发展的历史。这样明代《金瓶梅》之产生也就不显得那么突然了。是否可行，敬请考虑。

1997年6月

（本序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 言

世情小说，即描写现实生活中世态人情之小说，亦称之为人情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首列专篇，总结其特征为：“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亦谓之世情书也。”“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是论其内容特征；“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是言其思想性特征和结构手法也；“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是说其注重写实的风格。如作是观，世情小说显然与描写军政要事、歌颂往古先贤的军国政事、历史演义小说有所区别，亦与抒写豪杰壮举、描摹天神地仙奇才异术的英雄传奇、神魔志怪小说完全不同，它主要写的是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耳闻目见的真实人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以今人对小说的认识，小说之为表现现实最重要的文学类别，它的特质是：“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情节和具体的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辞海》缩印本1108页）。就此种意义而论，如探讨中国古代近乎“纯粹”意义上的小说类型，舍世情小说外，尚别无他途。可以说，世情小说的出现，方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真正摆脱了历史和英雄对其的浓重光照，向着自己独具

的领域——现实人生，开拓疆土，中国自具面目小说的真正开端，也应从世情小说算起。

世情小说，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流派，形成于明代追无疑问。但其源头颇早。就记事写人的传统，文学之向现实人生渗透，嘲谑世道，评斥善恶，先秦中的寓言已具备。魏晋以后的志人小说更为其推波助澜，促动小说倾其注意力于现实人生之中。而唐传奇中的一些名篇，基本上已具备后世世情小说讽世写世的特征。有的专家曾颇为精辟地指出：“武则天时代，张鷟写的《游仙窟》，……于写男女风流韵事中，间杂有对‘天道人情’的嗟叹，对‘命运迍邅’的牢骚，对‘沉迹下僚’的不满，已露世情小说的端倪。……蒋防的《霍小玉传》，通过李益和霍小玉的爱情悲剧，展示了男女之间的‘一旦色衰，恩移情替’的人际关系；白行简的《李娃传》通过世族公子荥阳生与娼女李娃的离合悲欢，控诉了门阀制度的残酷，等等，都带有世情小说的特色……”（《中国古代小说流派漫论》张俊先生文《走向生活的世情小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1月版）。如从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分野看，唐传奇及先秦寓言魏晋志人小说等，尚不构成明代世情小说的主源，只是具备其中的一些因素而已。如推世情小说的直接祖称，实为宋代说话话本中的“小说”一门。“小说”者，以短小之篇幅叙述当代现实生活中以民间细事儿女情长为主的普通人的故事也。事情小、人物小、篇幅小，故谓之“小说”。“小说”之分类，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踪参”等类的区别。韩南先生曾在《金瓶梅探源》一文中指出：“《金瓶梅》可能借用的白话短篇小说至少在八种以上。”张俊先生曾据此分析，《金瓶梅》中出现这几种小说中，“属‘灵怪类’的有《西山一窟鬼》，‘烟粉类’的有《志诚张主管》，‘传

奇类’的有《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和《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杆棒类’的有《杨温拦路虎传》及其他《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等”（同上）。从而在内证上证实了《金瓶梅》与宋元小说话本的渊源关系。

世情小说之渊源既明，明清两代自《金瓶梅》开始之三百余年世情小说发展的流变又如何呢？研究有关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一个缺憾就是，对《金瓶梅》以后世情小说的发展论述，不是语焉不详，就是缺乏系统条理的爬梳。近年诸多专家学者对《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的小说创作，曾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仍未能系统展示《金瓶梅》之后小说发展尤其是世情小说发展的总体脉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金瓶梅》后之小说创作情况复杂，整理总结一条分明的线索颇不容易；主观上是由于我们只盯住一两部名著，而忽视了对此前此后的众多同类作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积多年对明清两代小说创作普遍性的阅读和从事古代小说教学科研的体验，笔者在拙著《明清小说考论》一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10月版）《前言》中曾提到：

《金瓶梅》诞生后，中国长篇小说主体发展历程——世态人情小说，宣告开始。……在《金瓶梅》的余润下，中国婚恋性爱家庭伦理式小说，此后形成了三大类别：一类是以描写男女性事活动为主的艳情小说；一类是以“净化”的形式表现男女爱恋的才情小说（亦有人称为才子佳人小说）；一类是在男女情爱婚恋伦常的描写中勾连社会串汇市井以至融铸假托历史，以广阔的笔触表现社会芸芸众生的世情小说。

就世情、艳情、才情三类小说的表现特征而论，世情小说，描写社会层面较广，多属长篇巨著，《金瓶梅》后的所谓“中国长篇小说的主体类型”，亦主要指这一类型小说。如果说世情小说是《金瓶梅》的主干发展的话，艳情小说与才情小说，不过是《金瓶梅》这一株大树的旁逸之枝或斜出之株。前者主要有取于《金瓶梅》中对男女性爱活动赤裸裸的性描写，迎合市民社会庸俗的欣赏趣味，并汲取以往文言史传类小说中同类描写（如汉伶玄之《赵飞燕外传》、宋人之《迷楼记》、《大业拾遗记》等），加以作者的夸张想象而成。而才情小说，则是基本上经历了一次对艳情小说的否定之否定后，对上直接承续唐传奇爱情篇章的传统（虽然它的最早渊源可推至《史记》中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爱的描写），对下直接融入明代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时代以强调情欲合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反理学的思想狂潮和社会批判精神而形成的一派小说。它直接以艳情小说的“净化”形式——抛弃其无休止的对性爱活动欣赏性的赤裸裸的描写而出现，主要以近乎纯理想的形式体现这一时期富有民主意识的情爱婚恋观。

本书所讨论的，主要是自明中叶《金瓶梅》问世后至晚清“邛上蒙人”的《风月梦》、陈森的《品花宝鉴》等较早的近代狭邪小说兴起之前中国古典世情小说的发展历程（不包括艳情小说与才情小说）。

《金瓶梅》后之世情小说发展主线，依笔者所见，共经历了五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奠基期，主要标志是《金瓶梅》的问世。《金瓶梅》的出现，尤其是它对色彩斑斓的明代市井社会生活的写实手法，一改以往小说追求雄奇壮美的风格，以世俗风情的真实再现，直接为后世中国家庭伦理式世态人情小说开创了模式，

影响了尔后数百年中国小说的创作。

第二个时期是深化期，其主要标志是天启年间《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的问世。两书的特点是在《金瓶梅》创作的基础上，纠偏《金瓶梅》纯粹表现市井生活的纯世俗化倾向，以虚构的历史将《金瓶梅》开创的对世态人情的描写向深层的雅化方向发展。并力改《金瓶梅》中写欲的狂欢对生命圈的剥蚀，由短暂的爱欲追求代之以对永恒生命的向往，融儒家人生理想与纲常义理、仙释神奇异能、轮回因果等于一体，表达作者安邦定国、拯世济民的理想。

第三个时期是发展期，主要标志是明清之交《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等书的出现。两书进一步继承《禅真逸史》与《禅真后史》主题深化雅化的倾向，由《金瓶梅》之单纯对家庭伦常、市井社会的描叙，发展为对末世王朝自经济到政治，自文化到伦理、自世道到人心等方面的全面检评。明末政治之腐败、经济之崩溃、社会之混乱、人伦之丧失等，均在作者笔下得到充分表现。

第四个时期是高峰期，主要标志即清康熙至乾隆朝五大世情小说的出现。该时期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文人思想情态的复杂化，导致世情小说呈现多元的主题倾向。《野叟曝言》受国家统一盛强之感召，以浪漫想象之笔，虚构历史悠久的中华帝国对世界各国的征服，以表达儒家世界大同理想。《绿野仙踪》主要表现报世理想难以实现的知识分子归而修道，企图借助道家神仙之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虚幻梦想，是《禅真逸史》诸书主题倾向的另一种实现。《儒林外史》则抓住科举制下士人心态，以时代文人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衡准，揭示明清儒生在文、行、出、处诸方面的表演，成为批判明清选士制度最富时代性作品。《红楼梦》则以独特的对封建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以至社会人生的全面检评，跃登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华殿。从对前代小说的继承来说，《红楼梦》可说是《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两书的综合且雅化的结果。而《歧路灯》其书，则抓住封建时代败家荡子的教育问题，对旧制度的危亡，开出剂剂救世良方，企图挽救封建社会日益衰落的命运，和旧制度的危亡。

第五个时期是转化期，主要标志即乾嘉时期《镜花缘》与《蜃楼志》的出现。这个时期，由于清王朝统治的盛期即将成为过去，随着社会向近代的迈进，小说的评世气息加浓。《镜花缘》其书，在诸多问题上，如女性地位、科举选士、世道沦替、人心演变等，均以独特的童话寓言手法，做了评价。《蜃楼志》其书，更以洋商家庭出身的风流浪子苏吉士一生经历的描叙，揭示大清王朝历史转换期的时代风貌，成功塑造了我国早期商业买办资产经营者的风采。

与长篇世情小说相表里的是短篇拟话本小说。短篇拟话本小说，就其整体反映社会的程度看，与长篇世情小说没有多大差别。又短篇拟话本小说，实际是以宋人“小说”话本的直接后继者进入明清时代（“小说”与明清世情小说的渊源已如前述）。作为独特时代世俗人情的反映，研究明清世情小说，除应注目于在《金瓶梅》直接影响下产生的长篇巨著外，亦不能偏废导致《金瓶梅》诞生的宋人“小说”话本直接的后继者明清文人拟话本小说。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由宋人小说话本到《金瓶梅》等长篇世情小说的诞生是以突发演变比较激进的方式完成了由猿到人的转变的话，由宋人“小说”话本到明清拟话本不过是以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转变，其形式有别，但性质则一。

明清两代文人短篇世情小说，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一

书，曾区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万历以前（公元1619年以前），主要刊行的话本集有《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绣谷春容》等；第二个时期为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主要作品有《三言》及《初刻拍案惊奇》；第三个时期为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3年），主要作品为《今古奇观》、《二刻拍案惊奇》、《醉醒石》、《石点头》、《西湖二集》；第四个时期为清顺治康熙年间（公元1644—1722年），主要作品有别本《喻世明言》、《觉世雅言》、《豆棚闲话》、《欢喜奇观》、《三刻拍案惊奇》、《十二楼》、《西湖佳话》、《照世杯》；第五个时期为雍正至乾隆（公元1723—1795年）间，主要作品有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娱目醒心编》、《二刻醒世恒言》；第六个时期为嘉庆至光绪（公元1796—1908年）间，主要作品有《二奇合传》、《今古奇闻》、《西湖拾遗》。

郑振铎先生对明清短篇小说集创作的分期，除部分作品的成书年代值得商榷外，大部分推断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郑氏所区分之六个时期，除最后一期作品因时代过迟，基本不在我们论列范围（已进入近代小说发展时期），其他五期短篇世情小说创作所表露的思想倾向基本上与长篇世情小说的发展相一致。第一个时期的《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等，所收作品许多虽属宋元人旧篇，但却为《金瓶梅》的问世作了有力的旁证。如《清平山堂话本》中《柳耆卿诗酒玩江楼》，写柳永为从黄员外手中夺得美妓周月仙，竟在周月仙赴黄员外之约时，指使舟子强奸月仙，抓住把柄，使其心归于己。《京本通俗小说》中之《金主亮荒淫》，对金废帝海陵狂淫生活的描写。两故事中之主人公柳永与海陵，简直就是《金瓶梅》中西门庆的雏形。而《清平山堂话本》中之《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等，简直就是《金瓶梅》情色论的祖源。《刎颈鸳鸯

会》中之蒋淑珍经历及命运结局，实际为《金瓶梅》中潘金莲、庞春梅、李瓶儿诸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借鉴。

第二个时期天启年间的《三言》及《初刻拍案惊奇》，从冯梦龙对情的张扬，凌濛初与之桴鼓相应的表现，恰与该期长篇世情小说《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纠缠《金瓶梅》市井生活的纯世俗描写，将男女爱欲导向雅化，并正面肯定其价值的倾向一致。冯梦龙曾公开标举以情设教的旗帜：“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即是明证。

第三个时期崇祯年间。郑振铎先生所列作品，主要有《今古奇观》、《二刻拍案惊奇》、《醉醒石》、《石点头》、《西湖二集》。除《醉醒石》的创作，应归于清代，该期作品尚应包括《型世言》（《三刻拍案惊奇》）、《清夜钟》、《欢喜冤家》三部。该时短篇世情小说的创作倾向与上期相比是，伦理感召力的进一步加浓，社会批判广度的加大。揭世道之变易，人情之反复，抒发作者对社会政治现实人生的深重感慨，成为该期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如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序》所云：

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而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也。吾安知閭閻之务不通于廊庙，稗史之语不符于正史？

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是晚明社会的政治腐败、逆阉专权、

边疆多事、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当此情况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起而匡风救俗，重整儒家纲常义理亦是很自然的事。这一倾向，恰与《醒世姻缘传》、《金瓶梅》诸书对明末社会的全面检评相一致。

第四个时期为清顺治康熙年间。郑振铎先生主要列举的小说共八部：别本《喻世明言》、《觉世雅言》、《豆棚闲话》、《欢喜奇观》、《三刻拍案惊奇》、《十二楼》、《西湖佳话》、《照世杯》。除《欢喜奇观》（即《欢喜冤家》）和《三刻拍案惊奇》（实为明陆人龙《型世言》的改头换面之作）应归入上期外，对其他各书写作年代的断定，郑说大致不错。另应归入该期小说创作的尚有《醉醒石》、《无声戏》、《珍珠舶》、《风流悟》。这一时期短篇世情小说创作倾向，除一部分尚带明代小说愤世嫉俗之情（如《豆棚闲话》、《醉醒石》等），大部分作品都转移到单纯的伦理的宣传和欲爱情色的讨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随清王朝政权的巩固，清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舆论的控制。知识分子为免受文字狱之祸，短篇小说的创作只能就伦常节教的鼓吹、佛道因果的宣传、世俗人心的变易和男女艳遇奇闻等方面做文章。它基本上与该期广泛流行于文坛的才子佳人小说保持同步。需要指出的是，该期《照世杯》、《豆棚闲话》中之揶揄世情、嘲弄人生、讽今射古、斥恶彰秽的倾向，李渔之《十二楼》、《无声戏》对短篇小说艺术技巧的多方面探求，为稍后之《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的问世予一定影响。

第五个时期，郑振铎先生主要列举别本《拍案惊奇二刻》、《娱目醒心编》、《二刻醒世恒言》三部。其实除此之外，尚有《雨花香》、《通天乐》、《五色石》、《八洞天》等。该期之短篇小说创作倾向，从后四部看，大多是以讽世劝世之笔，来宣传伦理教化思想，欲使“暗昧人听之而可光明，奸贪刻毒人听之顿

改仁慈敦厚”(《雨花香》作者《自叙》)。《五色石》与《八洞天》作者,更以补天道者自居:“天道非也,不离人事者近是。如为善未蒙福,为恶未蒙祸……甚且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燕人之石则见珍,荆山之璞则受刖;良马不逢伯乐,真龙乃遇叶公;名才以瘡疾沉埋;英俊以非辜废斥。”因此,作者以廉价之笔,凭空编造“夏禹之不丧父,宣尼之不幼孤,皋鱼不悲风树,王褒不泣蓼莪;虞舜之亲母重生,闵损之先慈再世,汉昭侍奉钩弋,宋仁终养宸妃”等近乎子虚无有的故事,以达到宣传儒家纲常教义的目的。

本书所论述范围,上自《金瓶梅》问世的明嘉靖万历年间,下止清嘉庆道光年间的《蜃楼志》,约近三百年的中国世情小说创作。论述未及与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笔 者

1997年4月

王增斌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